

21 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的叙事模式

姚乐旗 彭文忠

摘要：21 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通过“对立”和“发现”两种情节模式，以深刻的社会指喻性和切己的问题意识，显现出对 21 世纪以来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中国方案”的正当性、合法性和进步性的释证、拥护和歌颂。同时，也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权力话语的对抗、更迭以及农民自身的迷茫、困顿与自我分裂，并对乡村根深蒂固的不良惯习和现代化的负质效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较全面地反映了 21 世纪乡村创业的艰难“追求”过程，表征出一种“近代的超克”情绪，鲜明地体现了 21 世纪乡村小说作家想象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方法。

关键词：农村现代化；乡村小说；创业书写；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23）04—0168—08

近代以来，乡土世界作为自然村舍的传统存在形态和自为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主动或被动地纳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遭遇着不断的变动和重组。杰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讲述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①从此种意义而言，21 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绝不是对 21 世纪以来乡村创业这一行为及其过程的简单记述，也不是单纯地描写一个个乡村创业致富神话，它呈现出极强的“及物性”和“现场感”，表征了中国模式下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形态。这种中国经验包含成就、教训，以及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历程中的一切特殊经历。^②所以，此类叙事文本都带有深刻的社会指喻性和切己的问题意识。

结构主义学家罗兰·巴尔特曾说：“共同的模式存在于一切语言的最具体、最历史的叙述形式里。”^③综观 21 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中的主体角色和行动功能，可以将这一叙事类型的大体情节概述为：乡村创业新人在现代智识或党的帮助和带领下，应对乡村的贫穷现实、基层恶势力、资本干涉和创业失败等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项目号：21&ZD26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研究”（项目号：192WB10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姚乐旗，男，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彭文忠，女，湖南工商大学数字传媒与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 年第 6 期。

② 李培林：《“中国经验”的内涵和基本要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 年 11 月 10 日。

③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477 页。

困难，或咬牙坚持、或东山再起、或扩大规模，最终创业成功，并带领乡民们共同致富。^①但乡村创业新人具有历险性质的“英雄之旅”，只是这一叙事类型的表层结构。21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对乡村创业这一特殊劳动形态的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乡村新人英雄气质的表达，更多的是对传统乡土现代化出路的擘画。因此，在“英雄之旅”这一基础的事序结构上，乡村小说衍生出不同的叙事模式，而每种叙事模式又都传递出不同的情感价值观念与伦理意识，显示出乡村小说对21世纪以来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中国方案”的正当性、合法性和进步性的释证、拥护和歌颂，也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权力话语的对抗、更迭以及农民自身的迷茫、困顿与自我分裂，对乡村根深蒂固的不良惯习和现代化的负质效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乡村小说作家想象中国乡村的新方法。

一、“对立”模式：乡村创业脚本的冲突与更迭

杨·穆卡洛夫斯基认为：情节“不再只是构造问题（各部分之间比例和连接），而是作品语义上的组织问题”，是“表现作为语义整体的文学作品特色的一整套方法”^②。“对立”模式是“一种由事件的对抗或事件向对立面转化构成的情节类型，它的深层结构是二元对立”^③。这种模式普遍存在于当代乡村小说的创业书写中，用于凸显乡村创业的历史性发展方向，带有明显的进化论的创作思维和歌颂政治意识形态的情感范畴。如合作化小说围绕农民入社与不入社两条道路的斗争展开，根据人物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分配其阶级、道德甚至外貌。于是，小说充斥着爱党与反党、无私与自私、善与恶以及美与丑的对立，使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被绝对化为唯一可选择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改革小说延续了这种写作思路，小说中凡是支持单干的人物便是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的，凡是继续拥护合作化的便是不懂灵活变通和唯极权政治马首是瞻的。因此，改革与开放成为乡村势在必行的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小说对乡镇企业家和基层干部善与恶交织的复杂性格书写也折射了市场经济浪潮下乡村创业伦理的内在矛盾与分裂。

而21世纪乡村小说一定程度上借鉴了20世纪50—90年代乡村小说对立式的情节模式，并根据不同的主题表达，呈现出浪子回头、异化审思和实力角逐三种叙事模式，表征了21世纪不同乡村创业脚本下恶与善、进与退、新与旧的对抗，显露了乡村创业合规律、合目的的新发展方向，也展现了时代大变局中社会的伦理震荡、精神分裂以及乡村创业者灵魂状态和文化人格的嬗变。

（一）恶与善：浪子回头的救赎之路

浪子回头是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母题，这一题材最早出自《新约·路加福音》，基本情节包括离家上路、放浪形骸、反省忏悔、洗心革面，其中放浪形骸和洗心革面是不可或缺的叙事要素。也因此，这一叙事主题带有明显的劝善意味和说教色彩。合作化小说也采用了浪子回头的情节模式，那些犹豫入社的“中间”农民和不想入社的“落后”农民，经过先进农民的劝导，最终明白了走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这种叙事模式对合作化运动的乐观想象，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露出宗教信仰般的情感动员功能与文化神性。21世纪乡村小说也套用了浪子回头的叙事模式，通过叙写乡村创业者对自身否定之否定的灵魂救赎，彰显了乡土文化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观强大的询唤能力。

在21世纪乡村小说的创业书写中，浪子回头模式里的离家上路情节表现为出走淘金。乡村创业者由乡入城的出走不仅仅是一种空间性的转移，它更是一种文化选择，代表了21世纪农民对自身物质或精神需求的重塑以及对过往生活方式的否定，这也是他们开始“英雄之旅”的第一步。但这类叙事的代表作如关仁山的《麦河》、孙惠芬《后上塘书》对乡村创业者离乡的书写着墨并不多，也侧面显示了农民进

① 彭文忠、姚乐旗：《乡村想象与现代性的新“中国方案”——论新世纪乡村创业“新人”形象的生成与建构》，《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② 胡亚敏：《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③ 胡亚敏：《叙事学》，第138页。

城在 21 世纪已是十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小说主要着力刻画乡村创业者在淘金过程中的自我解构与重建,初出茅庐的外来客如何被都市文明异化为利欲熏心的“经济人”。《麦河》中的曹双羊与《后上塘书》中的刘杰夫都是这类形象的典型,他们在城市创业成功的背后隐匿着一段血腥的发家史,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游走在社会秩序的边缘,甚至借刀杀人、谋财害命,并终日耽嗜于声色犬马,丝毫不考虑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但是,他们在某个阶段又突然开始陷入良心的审判,否定过往的生活方式。曹双羊在瞎子白立国的帮助下重建对土地的信仰,返乡创立麦河集团,并通过土地流转制使荒芜的田地重焕生机。为告慰祖先,提醒子孙后代不忘农民的根,他还在麦河墓地中间竖了一座“寻根铸魂碑”。刘杰夫在扶灵归乡的途中感受到来自村民们的善意,重拾建设上塘村的决心,发展生态农业。他们利用在城市创业的经验重新审视乡村发展,主动带领乡民共同致富,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乡土文化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观对这些失路之人和他乡之客的接纳和拯救。

21 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中的浪子回头模式依据创业者出走淘金、罪恶发家、反省忏悔、返乡创业四个主要行动功能展开,在入城与归乡、迷失与救赎、作恶与行善的内在情节张力中展现乡村创业者从逃离“恶托邦”到建设“乌托邦”的寻根之路,显示出乡土文化对商品经济社会伦理危机的巨大化解效用。而小说中恶与善的对峙从根本上来说是城与乡的对峙,它表现了 21 世纪乡村小说对传统乡村小说拒城归乡写作范式的承继,即城市被妖魔化,乡村被诗意化,城市与乡村的形象无论是在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气质上都被建构成截然相反的对立面。然而,21 世纪乡土小说又有意冲决这一叙事惰性,它试图在工业社会和乡土文化中间寻找平衡点,既否定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心不古倾向,又以工业文明为基点想象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前景。

(二) 进与退: 乡村创业致富的异化审思

异化主题也是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母题之一,文学中的异化是指:“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类丧失了自我和本质,丧失了主体性,丧失了精神自由,丧失了个性,人变成了非人,人格趋于分裂。”^①早在古希腊时期,索福克勒斯就在《安提戈涅》里指出:“人间再没有像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把善良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出可耻的事,甚至叫人为非作歹,犯下种种罪行。”^②也就是说,在人类早期文明中,文学就已经开始关注金钱对人的宰制与异化。而世俗意义上,致富是创业的直接动力和主要目的,财富积累的多少是衡量创业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虽然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悖论关系,但金钱强大的诱惑力和人类贪婪的本性,也促使无数乡村创业者被欲望吞噬,丧失道德,沦为金钱的奴隶。如果说浪子回头模式是描写乡村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抵抗异己力量,重新回归“人”的本质,找回诗意的乡土。那么异化审思模式则是一条与之截然相反的叙事路径,它反省人对“人”本质的叛离,批判金钱对人的异化作用,对乡土的诗意全无,流露出浓重的挽歌情调。

在异化审思模式中,乡村创业呈现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乡村创业者的正常创业阶段,乡村创业者靠自身的勤劳与智慧积极改变自身或乡村处境,踏实创业。第二个阶段是乡村创业者异常创业阶段,他们为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背弃人伦,靠走偏门发家致富。如在贾平凹的《秦腔》中,无论是夏天义的淤地设想还是夏君亭的建农贸市场计划,都是在正常轨道上的乡村创业。然而,随着农贸市场的建成,清风街的风气也日渐堕落,丁霸槽的万宝酒楼上尽是赌博、嫖娼之流。余华的《兄弟》中,李光头靠在刘镇倒卖日本旧西服发迹,随后在各创业领域全面开花,“李光头为我们刘镇群众从吃到穿、从住到用、从生至死,提供了托拉斯一条龙服务”^③。而李光头的致富神话也导致刘镇陷入了一种迷乱状态,耽于金钱与美色,世风日下,道法沦丧。在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楚暖暖与丈夫旷开田合力开办楚地居后,

① 蒋承勇:《自由·异化·文学——论异化主题在西方文学中的历史嬗变》,《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

② 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③ 余华:《兄弟》(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

又成立了南水美景旅游公司，但外来城市资本的加入，使旷开田迅速异化。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①乡村的现代化直接诱使了乡土文化的断裂，原本平静、祥和的乡村被迫或主动卷入金钱的暴力竞逐中，传统乡土文化也在金钱面前黯然失色，被日渐遗忘与丢弃。乡村小说在异化审思模式中以乡村创业者正常创业和异常创业、进步与退步的显性比较，突出乡村在现代文化侵蚀下的精神失落，风土乡情、伦理纲常、基层政治等的全线崩毁，深刻反省乡村美丽新世界“画皮”背后骇人的“末世”景象。而在异化审思模式中，乡村小说作家们尤其爱选用酒楼、酒店意象，以这个带有城市文化象征意味的空间呈现现代金钱崇拜与享乐主义对乡村的冲击，也在这个欲望潜藏的场所暴露出乡村日趋严重的伦理危机。但总体来说，异化审思模式并不反对现代性，21世纪乡村小说虽向往乡村的牧歌情调，但也知晓乡村的发展离不开现代文明。他们试图以审思异常创业的方式，呼吁乡村创业者在利与义之间寻找平衡点，但他们更悲哀地意识到这几乎是一种奢望，所以小说中也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挽歌情调和对乡村现实的复杂态度。正如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的深情诉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②

（三）新与旧：乡村话语权力的实力角逐

21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中的浪子回头模式和异化审思模式突出的是乡村创业者主体意识内部对乡村创业理想范式和“人”本质的回归与叛离，多表现为异己力量作用下的自我对抗。而对乡村创业新旧力量实力角逐的书写，则凸显的是乡村整体内部两大势力、两种话语和两条道路的对抗，表达了这一时期乡村创业者破旧立新的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新旧冲突叙事在当代乡村小说，尤其是涉及农村改革题材的小说中十分常见，表现为新旧力量在矢量时间观下的较量，蕴含着新事物产生必然伴随着旧事物消亡的进化史观。而这种写法之所以普遍，一方面是由于现代性本身决定的，“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③。现代性意味着对旧事物一往无前地辩证否定，所以，当代乡村小说中所谓的“新旧”力量也并不是恒定的，《创业史》里的郭振山既是土改运动中的先进人物，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反面典型；《平凡的世界》中的田福堂是双水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推行者，但当大集体解散后，也只能坐在磨盘上唉声叹气。而衡量新与旧的主要标尺便是时代的需要，故而新旧力量的更迭实际上暗指的不仅是时代的更迭，更是乡村话事权的转移。另一方面，这种写法也与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有关。与西方呈明显阶段性、历时性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处于新旧杂糅的共时态中。因此，当代乡村小说创业书写无可避免地要叙写乡村变革过程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价值体系的对抗。

福柯认为：“从所体现的信仰、价值和范畴看，话语就是言语或书写，它们构成了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构成了对经验的组织或再现，构成了用以再现经验及其交际语境的语码。”^④21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中实力角逐模式的叙事话语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它通过新旧对峙的故事要素，在反向离合的二元锁并结构中突出现有秩序的合法性。这类故事的基本叙事套路是贪恋权力的乡村过去当权者靠权力意志创业，为取得短暂的经济效益，不惜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前景置于不顾，而创业新人结合乡村具体的优势资源，以市场思维为导向，制定出符合乡村长远发展利益的创业方案，并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裕。如冯积岐的《村子》中田广荣几十年来在松岭村一手遮天，祝永达担任村支书后，先坚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创业方略，发展松岭村的石灰和水泥产业。等这两大拳头产业稳定后，又开始进行产业调整，发展苹果种植等绿色农业，使松岭村的民生日益改善。在关仁山的《日头》中，权桑麻靠着集权统治打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4页。

② 贾平凹：《秦腔》，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563—564页。

③ 汪晖：《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

④ 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着政策调整的幌子将村办集体企业转为权家所有，而金沐灶则一心为村民争取利益，在看到自己开办的铸铜厂污染环境后，主动关闭，并为村里招商引资，指导村民发展绿色农业。

乡村小说创业书写中的实力角逐模式在新与旧的整体对照结构下，突出了乡村基层政治“过去”的专制和“现在”的民主，乡村创业环境“过去”的垄断和“现在”的公平，乡村发展思路“过去”的目光短浅和“现在”的深谋远虑。这类叙事深刻展现了乡村曾经失序的政治生态图景，而那些地头蛇、山大王、土皇帝似的村长、村支书形象也映射了某一历史时期极左政治的统治阴影，更说明了官本位文化在传统乡土的根深蒂固。而乡村创业新人的成长，也预示着乡村传统权力的式微，基层民主的服务职能被强化。但其中对乡村创业新人的刻画也并未摆脱官本位文化的束缚，这些创业新人往往在创业成功后当选为新的乡村领导者，被指认为乡村社会新的救世主。“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①，实力角逐模式中乡村旧势力的日薄西山和新势力的蒸蒸日上标志着乡村政治权力的转移，也就是新的时代政治力量及其所倡导的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中国方案”在中国土地的扎根和确立。而新“中国方案”下的乡村被描绘成有着海晏河清的基层民主政治、山川秀丽的生态环境、淳朴互助的民风乡情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这些现代化想象既是对传统乡村发展思路的反思，也是对乡村未来发展前景的企盼，但它们更是对当下乡村建设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的解释、维护与歌颂。

正如丁帆所指出的一样，当乡土文学遭遇到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诱惑和压迫时，作家主体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对物质文明的向往，另一方面是对千年秩序的失范痛心疾首。^②21世纪乡村小说作家们在对立模式中以恶与善、进与退、新与旧的对比，深入考察乡村社会的痼疾，鞭笞都市文化对传统乡土的异化，呈现出乡村社会在市场经济熏染下复杂的生存形态。但与“五四”时期乡村小说批判乡土文化的保守、落后，农民的劣根性，以及改革开放后痛心疾首的“废乡”书写不同的是，21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并不是破而不立的，它有意识地借助乡村创业新人的创业行径影射乡村理想的发展形态，思考农村现代化的出路。这种“乌托邦”式的乡村形态虽是当下乡村现实的部分真实写照，但它又刻意掩盖了新乡土经验下乡村社会的新矛盾。因此，这类写作也体现出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

二、“发现”模式：乡村创业的螺旋复进与“主体生成”

如果说“对立”模式描写的是情节在语义上的相反变化，那么“发现”模式则表现的是情节在语义上的相应变化；如果说21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中的“对立”模式突出强调的是乡村创业的转向和不同乡村创业脚本之间的对抗，那么“发现”模式则更为单纯、详细而完整地叙写了乡村创业从无到有、螺旋复进和不断被“追求”的过程以及乡村创业者在此过程中的“主体生成”。而此种模式下既有书写个体创业者成就自我的创业传奇，也有展现新时代基层扶贫干部成就集体的新“山乡巨变”故事。它们都以乡村创业的发展过程为主线，直面21世纪乡村社会现实，从多个层面深刻剖析乡村社会结构，着力表现了乡村创业的艰难曲折以及乡村创业者革故鼎新、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一）乡村个体创业的艰难“追求”

雷鸣将当代乡村小说中“个体致富”叙事的情节链条概述为：“穷则思变→遭遇挫折（受骗或遭遇天灾）→坚持发展副业→个人生活好起来→带领大家共同致富。”^③尽管这一叙事模式在当代乡村小说创业书写中十分常见，甚至老套，但为了凸显乡土文化和共同富裕观的教育功能、都市文化强大的异化能力和乡村新势力的正确，对立”模式中乡村创业者的“致富”几乎都是一蹴而就的，不仅缺乏对乡村创业过程的细致描摹，而且对乡村创业这一具有风险性的经济行为的理解和预期也过于理想和乐观化。相较而言，

① [美]艾莉森·利·布朗：《福柯》，聂保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8页。

②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③ 雷鸣：《乡村建设之寻路与中国乡土小说的变调——以长篇小说〈湖光山色〉〈金谷银山〉为例》，《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

“发现”模式中对乡村个体创业艰难“追求”过程的书写则更真实地再现了乡村个体创业不断“遭遇问题”而后“解决问题”的螺旋复进的发展过程，在起承转合的结构中突出了乡村创业的艰难及其阻力所在，以小见大地隐喻了整个乡村发展的现实情状，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表现了乡村创业者的个体成长，增强了乡村小说创业书写的传奇色彩。

格雷玛斯以语言学为模式，力图在故事内部的角色模式中寻找出基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再按照角色模式所引发或经历的功能性事件概括出故事基本的情节模式。他按照人物所承担的功能性任务，将故事人物划分为主角和对象、支使者和承受者、助手和对头。这六个角色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支使者引发主角的行动，主角的行动指向一定的对象，在此过程中主角往往遭到对头的阻挠，通过助手的帮助，主角终于克服困难，获得对象，并授于承受者。^①在乡村小说的创业书写中，主角是乡村创业者；对象是乡村创业的目的，即致富或乡村建设；支使者是乡村创业的诱因，它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也可以是文化的，是乡村创业的动力之源；承受者是乡村创业致富的实际受益人，也就是乡村创业者本人或整个乡村。这六种角色是乡村小说创业书写角色设置共同的类型标识，虽然其中的部分角色并不以真正“人物”的形式存在。

而“乡村个体创业的艰难‘追求’”这一叙事类型的关键叙事要素就是助手和对头这两种角色。“对立”模式中助手这一角色的设置并不十分明显。因为乡村创业者的成功往往比较简单，所以几乎不需要助手的帮助。而如果把乡村创业成功的原因归纳为广义上的助手的话，这些助手则多是观念性的，要么是乡土文化、共同富裕观，要么是乡村创业者的新“中国方案”，而它们也是创业的诱因，即支使者。而在“乡村个体创业的艰难‘追求’”这一叙事类型中，助手这一角色多是独立的。如《湖光山色》中楚暖暖受骗后是谭教授指出楚长城的价值，帮助楚暖暖创业成功，而薛传薪的现代管理理念也使楚暖暖的生意进一步扩大。《金谷银山》中的泰奶奶和孙教授为范少山发展金谷子、金苹果种植业提供了关键性帮助。此外，“对立”模式中的对头角色也很单一。实力角逐模式中的对头是乡村旧势力；浪子回头模式和异化审思模式中对头都是自己，或是罪恶的都市文化。但在“乡村个体创业的艰难‘追求’”这一叙事类型中对手往往不止一个，他们常常具有极强的破坏力量，所以也使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如《湖光山色》中的楚暖暖先是被卖假农药的商贩骗，村支书詹石磴趁火打劫，占有楚暖暖，而“帮手”薛传薪在利益面前逐渐展露真面目，同为“主角”的丈夫旷开田也被金钱和权力异化为“对手”。《白岸》中的张海涛被推举为村办企业的带头人，他先后遭遇贾富安的诬陷、姚志远的“招安”策略和司法机关的误审，两次被拘留。《金谷银山》中范少山的创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前期个体创业面临失败的婚姻，后期带领村民们共同致富，而乡村的闭塞贫穷、伦理失范，外国种子的市场挤兑和回乡的“捣乱分子”都是其创业道路上的阻碍。

“乡村个体创业的艰难‘追求’”这一模式紧紧围绕乡村创业者的个体创业活动开展叙事，在对乡村创业不断遭遇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书写中折射乡村创业的困境和出路所在。这类叙事中的帮手多为有现代智识、现代商业头脑的能人或是有德行的乡村老人，表明了乡村创业离不开科技、现代商业经验、乡土文化等重要支撑力量。但对帮手的想象上，虽时代感十足，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基本每本小说都有一个某大学的农业教授。而农业教授往往将乡村创业者的个体创业与乡村建设联系在一起，是农村现代化的新“中国方案”的提出者，而乡村创业新人的贡献就在于对新“中国方案”的完美执行上。由此，乡村个体创业者在一次次的磨难中完成了“主体生成”。此种表达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21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依靠科学与技术，这种观念与20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学崇拜思潮密切相关。第二，农业教授是农业现代化领域的权威人士，其制定的方案是极为准确的。第三，农业教授所制定的方案与国家正积极倡导的方案高度一致。也就是说，21世纪以来国家倡导的农村现代化方案是科学的、权威的、准确的，而小说中对乡村创业者的创业成功并带领乡民们共同致富的描写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这类

^① 罗钢：《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

叙事的科学崇拜背后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意涵，其中对手的复杂多样也说明了“稳态的乡土社会结构变成了一个飘忽不定、游弋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中间物’”^①，这些对手不仅仅是乡村创业者实现“追求”过程上的阻碍，更是乡村发展的症结所在，但这些对手最后都会被战胜和解决，乡村的现实矛盾也以想象性的方式被消除。

（二）乡村集体创业的新“山乡巨变”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而后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部署脱贫攻坚任务，文坛就此掀起了一股以乡村脱贫攻坚为题材，描写新时代基层扶贫干部带领乡民共同创业致富的创作热潮。而这也是21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中最特殊的一种叙事类型。一方面，这类叙事带有明显的主旋律文学的特征，它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张扬是显性的。另一方面，这类叙事以乡村集体创业为书写对象，而其他叙事类型中多是乡村创业者先个体创业再带领村民集体创业致富。此外，这类叙事中的基层扶贫干部是被委派到乡村的，与在乡创业、返乡创业不同的是，这种入乡创业是外来力量对乡村内部世界的改造。消除乡村地区的绝对贫困被中国共产党形容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也表明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所以这类叙事也采用了“艰难‘追求’”的叙事模式，在“创业起步—遭遇问题—解决问题—再遭遇问题———创业成功”的叙事逻辑中突出了乡村集体创业的艰难以及基层扶贫干部的成长。这类叙事的美学特征和其书写的创业类型明显与农业合作化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情节反观脱贫攻坚小说，更能清晰地看出此类叙事内在的结构形式和所受的文学经验的影响。

以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为代表的初期农业合作化小说多叙写的是作为领导力量的干部下乡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在阶级斗争中帮助农民建立生产互助组、合作社，促使农村发生“山乡巨变”。但由于此种叙事缺乏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原发性”的阐述，很快遭到批评，使后来描写农民自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创业史》被推举为农业合作化小说的范本。总体而言，初期农业合作化小说表现出明显的类型化叙事倾向，基本按照工作队下乡—指导—胜利—离开的行动逻辑展开叙事。脱贫攻坚小说也采用了工作队下乡这一叙事模式，从基层扶贫干部的下乡写起。信心满满的基层扶贫干部下乡后很快遭遇挫折，而此时他们在工作处理方式上也并不成熟。如赵德发的《经山海》中的吴小蒿初入楷坡镇，就因不适应环境多次碰壁。陈毅达的《海边春秋》中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刘书雷在处理舆情的经验上也稍显不足。忽培元的《乡村第一书记》中的白朗更是一上任就遭遇村民们的下马威。而小说也通过这种快速入戏的方式，烘托出了基层扶贫工作的艰巨性，而这也是基层扶贫干部实现“主体生成”的起点。紧接着交通不便、村民懒惰、乡村黑恶势力等多种导致该地区贫困的矛盾陆续浮出水面。面对困难，基层扶贫干部秉持扶贫先扶智（志）的工作原则指导扶贫工作，制定扶贫方案，最终乡村不仅胜利脱贫，在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也得到改善，而基层扶贫干部也成长为乡村走向振兴的中坚力量。

21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中的“发现模式”以记录乡村创业螺旋复进的发展过程为切入点，以纪实性的笔法书写出了21世纪的乡村创业史，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乡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形象地展现了乡村在致富道路上的新“山乡巨变”。而这一叙事模式也具有成长小说的叙事内核，乡村创业者在不断地被考验中完成“主体生成”。

三、结 语

无论是乡村小说创业书写中的“对立模式”还是“发现模式”，它们都深刻体现了作家想象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方法。这些方法既是对现实的有力观照，描绘了城乡融合和生态文明视野下乡土的新经验；也是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出路的展望，显示了经济社会乡村创业者们对重建乡土之“真”、共同富裕之“善”和家园意识之“美”的追求，也表征出一种浓厚的中国式的“近代的超克”情绪，即有意识地总结和反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西方现代化为仿效对象的问题所在，试图以传统乡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同富

^①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

裕观平衡、抗击商品经济浪潮下乡土文明的破碎,进而总结并确立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然而,尽管21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力避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充分展现了文学的想象力,但总体而言,这一书写类型的叙事模式都不够新颖。如浪子回头、异化审思和实力角逐叙事的情节都比较简单,而且这些模式早已诞生,并不是创业书写所特有的。甚至可以说,《创业史》这一部小说就涵盖了上述三种叙事模式。而对乡村个体创业艰难“追求”过程的书写也直接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脱贫攻坚文学在讲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上也直接借鉴了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文学经验。所以这些叙事模式总体而言缺乏足够的创新,在还原21世纪中国农民复杂的生存本相上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而对过去已有文学经验的过分依赖,以“新瓶”装“旧酒”,缺乏沉潜钻研在叙事上寻求突破的耐心和魄力,也是当下“快”时代发展节奏下,文学普遍面临的发展困境。

所以,乡村小说作家要主动打开文学视野,合理借鉴优秀的中国或外来文学经验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更重要的是,作家们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这些叙事模式之所以不够新颖,从根本上来说,一是作家们早已离开乡村,成为衣食无忧的都市人,缺乏乡村的直接生活经验。他们对乡土的认知多来自于间接经验,或是以旧有生活经验模式来臆测当前乡村的现实生活。因此,他们对乡村创业的思考 and 想象难免会流于简单和浮夸,小说的叙事也难免僵化生硬,缺乏创新。二是乡村小说创业书写中的叙事模式往往观念性大于审美性,作家们因急于传达某种观念,而使小说落入主题先行和模式化的窠臼。对此,作家们应沉下心来,躬身体验乡村生活,深入考察中国乡村近百年的沧桑变化,总结出乡村发展前进的历史逻辑,挖掘21世纪独特的新乡土经验,弱化小说的说教色彩,提高文学性,写出真正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中国故事”。

Narrative Mode of Entrepreneurial Writing of Rural Novels in the 21st Century

YAO Le-qi¹ & PENG Wen-zhong²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2. School of Digital Media and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Abstract: The entrepreneurial writing of rural novels in the 21st century adopts two plot modes of “opposition” and “discovery”. By profound social metaphor, self-important problem awareness, it shows the justification, support and praise of the validity, legitimacy and progressiveness of the new “China Plan” for rural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21st century. It also reveals the confrontation and change of rural power discours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 confusion, difficulties and self-separation of farmers themselves. The study also deeply criticizes and reflects on the deep-rooted bad habits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moder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reflects the difficult “pursuit” process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It represents a “vercoming of modernity” emotion and embodies the way that writers of rural novels in the 21st century imagine Chinese-style rural modernization.

Keywords: Rural Modernization, Rural Novels, Entrepreneurial Narrative, Narrative Mode

[责任编辑: 廖 霞]